

唐研究

第十六卷

唐代邊疆與文化交流研究專號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 研 究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 十 六 卷

Volume XVI

“唐代邊疆與文化交流”研究專號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一〇・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10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唐研究·第16卷/榮新江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1-18382-3

I. ①唐… II. ①榮… III. ①中國—古代史—研究—唐代—文集

IV. ①K242. 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63602 號

書 名: 唐研究 第十六卷

著作責任者: 榮新江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8382-3/K · 075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件: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編輯部 62750577

印刷者: 北京宏偉雙華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37.75 印張 592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78.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件: fd@pup.pku.edu.cn

主辦單位：唐研究基金會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主 編：榮新江

編 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尚君 鄧小南 高明士 葛承雍 葛曉音
葛兆光 侯旭東 黃 征 陸 揚 羅 丰
羅 新 妹尾達彦 孟憲實 孟彥弘 寧 欣
齊東方 榮新江 太史文 王小甫 吳玉貴
徐 俊 張國剛 朱玉麒

助理編輯：雷 聞

※ ※ ※

Chief Editor: Rong Xinjiang

Editors:

Chen Shangjun Deng Xiaonan Ge Chengyong
Ge Xiaoyin Ge Zhaoguang Hou Xudong
Huang Zheng Kao Mingshih Lu Yang
Luo Feng Luo Xin Meng Xianshi Meng Yanhong
Ning Xin Qi Dongfang Rong Xinjiang Seo Tatsuhiko
Stephen Teiser Wang Xiaofu Wu Yugui Xu Jun
Zhang Guogang Zhu Yuqi

Assistant Editor: Lei Wen

目 錄

“唐代邊疆與文化交流” 研究專號

論 文

- 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 王小甫 (1)
- 漢唐時期中日關係中的外交文書 王貞平 (27)
- 作為歐亞禮儀的隋唐外交禮節 斯加夫 (75)
- “唐羅戰爭” 關聯問題的再探討 拜根興 (91)
- 規矩或率意而為？
——唐帝國的馬印 羅 丰 (117)
- 唐置輪臺縣與絲綢之路北道交通 王炳華 (151)
- 和田古代遺址的重新定位
——斯坦因地圖與衛星圖像的勘定與解讀
..... 西村陽子 北本朝展 (169)
- 新見唐代郭晞夫婦墓誌及其相關問題 趙力光 王慶衛 (225)
- 唐幽州雄武軍(城) 位置再考 李鴻賓 (249)
- 唐後期河東北部的鐵勒勢力
——從鷄田州的變遷說起 蘇 航 (261)
- 唐宣宗時期的西北邊境政策試析 村井恭子 (279)
- 唐貞順皇后(武惠妃) 石槨浮雕線刻畫中的西方藝術 葛承雍 (305)

釋“燒尾”

- 一個唐代名宴稱謂的文化人類學解讀 高啟安 (325)
- 讀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家族墓誌割記 趙和平 (343)
- 古突厥文寫本《占卜書》新探
- 以寫本形態與文本關係為中心 芮跋辭 胡 鴻 (359)
- 新見唐張舟詩考 張京華 (387)
- 新羅崔致遠的著述及其歷史文化價值 李時人 (401)

* * * * *

- 唐“望秩”類官員與唐文官類型 賴瑞和 (425)
- 職能與空間
- 唐宋臺、諫關係再論 方誠峰 (457)
- 李錡叛亂的軍團構成
- 唐代藩鎮軍事構造的個案研究 李碧妍 (483)
- 新出唐誌與中古龍門淨土崇拜的文化生態
- 以蕭元禮墓誌記事為緣起 張乃騫 (507)

書評論文

- 《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的輯校與研究
- 評吳玉貴《唐書輯校》 孟彥弘 (521)

書評

-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 劉 屹 (545)
- 李全德《唐宋變革期樞密院研究》 賈連港 (552)
- 辻正博《唐宋時代刑罰制度の研究》 魏 斌 (557)
- 大津透編《日唐律令比較研究の新段階》 張文昌 (564)

- 新書目 (577)

目 錄

第十六卷作者研究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587)
《唐研究》簡介及稿約	(589)
投稿須知	(591)

Contents

Special Issue on “Frontiers and Culture Exchange in Tang China”

Articles

- On the Chang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Wang Xiaofu (1)
-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Han-Tang Period Wang Zhenping (27)
- Sui-Tang Diplomatic Protocol as Eurasian Ritual Jonathan Karam Skaff (75)
- Further Discussion of Issues Related to the Tang-Silla War Bai Genxing (91)
- The Horse Brand Seal Systems of Tang Dynasty Luo Feng (117)
- The Location of Luntai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Northern Silk Road Traffic
..... Wang Binghua (151)
- Re-identify Ancient Ruins in Khotan: Match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Stein
Maps and Satellite Images Nishimura Yoko and Kitamoto Asanobu (169)
- Study on the Newly Unearthed Epitaphs of Guo Xi and His Wife
..... Zhao Liguang and Wang Qingwei (225)
- Some Notes on the Location of Xiongnu Army/Fort of the Tang
..... Li Hongbin (249)
- The Influence of the Tiele Force in the Daibei Region during the Late Tang:
A Case Study on the Adie Tribe Su Hang (261)
- A Consider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Governance Policy during
Xuanzong Era for the Northwest Peripheral Region Murai Kyoko (279)
- Western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Relief Paintings on the Stone Coffin
of Queen Zhengshun (Honored Consort Wu) of Tang Dynasty
..... Ge Chengyong (305)

Interpretation of <i>Shaowei</i> 燒尾, A Famous Banquet in Tang Dynasty from a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Gao Qi'an (325)
Research on the Epitaphs of the <i>Shi</i> Family unearthed from the South Suburbs of Guyuan	Zhao Heping (343)
The <i>Īrq Bitig</i> , the Book of Divination: New Discoveries Concerning its Structure and Content	Volker Rybatzki and Hu Hong (359)
Brief Research on a Newly-discovered Poem by Zhang Zhou	Zhang Jinghua (387)
A Sillar Cui Zhiyuan's Writings as well as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Li Shiren (401)

* * * * *

The <i>Wangzhi</i> Category of Official Posts in the Tang and the Typology of Tang Officials	Swee Fo Lai (425)
Functions and Locations: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sorate and the Remonstrance Bureau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ang Chengfeng (457)
The Corps of Zhenhai Jun (Zhexi) in the Period of Li Qi Rebellion	Li Biyan (483)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Worship of the Pure Land in Longmen Area in Medieval China	Zhang Naizhu (507)

Review Article

Compilation and Study of <i>Tang Shu</i> Excerpted in <i>Taiping Yulan</i> : Review of <i>Tangshu Jijiao</i>	Meng Yanhong (521)
---	--------------------

Reviews

New Publications	(577)
------------------------	-------

Contributors	(587)
Introduction to the <i>Journal of Tang Studies</i>	(589)
Note from the Editor	(691)

唐五代北邊的內外之際與國家認同

王小甫

中國是一個多族群國家，早在先秦時期的分封共和時代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五方格局”^{〔1〕}；秦統一後進入帝國時代，形成了以中央王朝為主體的帝國政治體系，積累起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後來幾經分合，周邊族群爲了參與資源分享，紛紛以各種方式進入帝國的政治體系，積極認同中國，壯大民族凝聚。周邊族群與中原歷史官僚社會相互關聯、互爲作用，成爲中國中古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

隋唐是繼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一統時期，各族群間政治聯繫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更加廣泛深入。貞觀四年（630）唐滅突厥汗國，“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2〕}在大唐帝國這個政治共同體內，處於歷史官僚體制不同層級的各族群共同分享帝國的發達資源，也爲帝國提供自由流動資源，強化了國家認同，給中華民族留下了恒久的歷史記憶^{〔3〕}。

長期以來，學界對中國中古周邊族群與中原社會關係的研究多側重於以中原王朝爲中心向外觀察，例如華夷秩序、胡漢體系、農牧世界、邊疆史地以及冊封體制、天朝禮治甚至朝貢貿易圈之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學界改變傳統

*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6—10世紀中國的族群凝聚與國家政治體制演進研究”課題成果之一。

〔1〕 參王鍾翰《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96頁以下。

〔2〕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貞觀四年三月條，中華書局，1976年，6073頁。

〔3〕 從古至今，人們提到中國特色多指漢、唐，如漢學、唐人，其間緣故值得深思。

的二元視角，轉而對中國歷史上族際流動乃至族群凝聚和國家認同進行研究^[4]，使相關認識得以深化，國家的空間界限（地域範圍）也更加明晰^[5]。換言之，中國古代各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共有共享、凝聚認同的進程更具有本質意義，更值得揭示彰揚。本文即擬以唐五代北方及西北沿邊地區的族群活動與族際關係為例，從統治者的政策目標和周邊族群的政治動向間相互作用著眼，嘗試探討各族群為爭取資源或參與共享而力求認同、實現整合的過程^[6]。作為研究對象的概念仍循舊籍：（塞）內、外蕃^[7]，主要從歷史官僚體制的層級著眼；熟番、生番，則主要從社會發育程度著眼。

一、“逐水草而居”再認識

本世紀初的一個暑期，我們一行到東蒙（主要是內蒙古赤峰市）和遼西（主要是遼寧朝陽市）進行考察。赤峰市的文物保護工作做得非常好，每一個旗、縣都有當地的博物館，文物展品頗具特色、豐富迷人，既有利於學習瞭

〔4〕 參見姚大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與國家認同》，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77頁。

〔5〕 迄今為止，人們只是把古代中國定義在時間層面——歷代王朝的延續。其實，如果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考察，還可以據最高首領及官僚體制、歷史領土、空間邊緣及法令效力等內容對作為各族政治共同體的中國在空間層面作較為具體明確的界定。

〔6〕 本文的理論部分嘗試借鑒了S. N. 艾森斯塔得在《帝國的政治體系》（閻步克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書裏所運用的歷史社會學的結構分析理論，以及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等書所介紹的社會人類學的族群認同理論。

〔7〕 楊聯陞認為，蕃字與藩同義，“意思是‘屏藩、藩臣’”（《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氏著《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2頁），不過，帝國時代的內、外（蕃）並非只是先秦時期“內華夏，外夷狄”那種文化意義，雖然內、外“邊界不必常是一條線”（同前，3頁），但它應該是歷史官僚社會中不同區位群體（政治層級）的空間界分，例如唐代的邊州都督府與羈縻都督府州之別。我想，中國傳統所謂的塞內（下）、塞外（上）與此意義差近。例如，《冊府元龜》卷一七〇《帝王部·來遠門》略云：“（開元）八年二月敕關內、河東、河西入朝新蕃酋等曰：嘉爾蕃酋，慕我朝化，相率歸附。深宜輯乃戎落，捍彼方隅，使烽火無驚，障塞咸謐。必厚賞崇班，當取富貴。其今春不入朝都督、衙官並箭頭將軍在蕃者，已令取軍中庫物，各賜爾等衣一副。部落有疾苦，量給藥物。”（周助初等校訂本，鳳凰出版社，2006年，1893頁）據研究，這裏提到的這些蕃部，無論突厥、鐵勒，都是安置在各道軍州側近的內蕃部落制羈縻州，此即所謂“內附”。參蘇航《唐代北方內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72—76頁。

解，也很值得參觀欣賞。可是，看得多了，我就發現赤峰各旗縣博物館的歷史陳列大都是從秦漢時代直接就到了契丹遼代，也就是說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當地的歷史文化幾乎是一片空白（記得只看到巴林左旗博物館陳列有幾個南楊家營子出土的鮮卑手製黑陶罐屬於這個時期）。當然，不能說這段時期這裏就沒有人群活動，這種情況也許只是由於所做工作的局限。然而，同屬於鮮卑文化，往南翻過松陁嶺（今努魯爾虎山）進入遼西立刻大為改觀。眾所周知，“朝陽北票喇嘛洞墓地”和“朝陽十六國三燕龍城宮城南門遺址”都曾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而這兩處主要都是鮮卑文化遺跡。其中北票喇嘛洞鮮卑貴族墓地是迄今為止發掘規模最大的鮮卑人文化遺存，共發現墓葬 419 座，時代為 3 世紀末到 4 世紀初，出土了近 3000 件文化遺物。墓葬形式和很多隨葬物等均為以往所不見，展示了鮮卑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色。頭盔、鐵甲、馬具組成的甲騎具裝，是中國已知最早的實物。大量鐵製兵器和生產工具共存，表明鮮卑人內部社會結構已由遊牧向農耕轉變。馬具、金器等還可以看出對朝鮮半島和日本同類器物的強烈影響。

我以為，東蒙、遼西地區魏晉隋唐時期考古文化的反差，很可能反映了中國古代北方族群歷史活動空間的轉換同時也是他們社會政治文化的演進。換言之，鮮卑、契丹諸族在南下進入遼西之前本身社會還很不發達，經濟文化都很落後。據史書記載，東胡各族群（烏桓、鮮卑、奚、契丹）差不多都有一個從大漠深處向邊郡塞外，然後是沿邊州郡，最後進入內地成為區位或功能群體（經常是二者兼而有之），甚至入主中原的空間活動過程，這當然也是他們求取發達資源從而社會文明進步的過程，考古現狀應當是這一歷史（兼及時間和空間）進程的真實反映^{〔8〕}。

我發現，對周邊族群朝向中原內地轉移的這種動態空間考察非常有意義。後來的安祿山、史思明群體經歷過塞外—遼西—華北的轉移過程，唐末五代的沙陀人也經歷了塞外（外蕃）—代北（內蕃）—雁南（邊州）的轉移過程。這一轉移過程其實就是周邊族群主觀認同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中原社會對這

〔8〕 參拙文《隋唐五代燕北地區的民族遷徙與分佈》，收在拙編《盛唐時代與東北亞政局》，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433—434 頁。

些群體的認知接受過程，中國古代民族共同體的想象就在這一過程中演進變化。安史集團以後因其權力合法性來源與帝國傳統意識形態發生明顯對立^[9]，纔中斷了這一認同過程。所以我認為，就研究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和國家認同而言，這樣以群體為主的動態空間考察比概念化的關係定性（冊封、朝貢之類）和靜態的地域分層（如所謂“中間地帶”）更能說明問題。

因此，古代北方草原族群一批又一批前赴後繼地奔向南部綠洲地區的邊緣地帶，很可能並不是為了進行經濟掠奪，也不是由於受到政治排擠，而只是想要尋求更為適宜的生存環境條件，想要分享南部綠洲社會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逐水草而居”是草原牧人遷徙活動的根本動因。正如國際突厥學大師巴托爾德在論及中亞操突厥語諸族的伊斯蘭化時所說：“同其他一些宗教比較，伊斯蘭教的主要有利條件自然是根據下列的事實的，即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領域中，伊斯蘭世界在這個時代的文明民族裏具有顯著的優越地位。遊牧民常常急需取得文明國家的產品，特別是衣服。凡在文明民族和遊牧民之間建立了商業關係的各處（在中國、伊斯蘭世界和後來的俄羅斯），遊牧民想買進的，首先是紡織品。和遊牧民做生意，對文明民族來說也是同樣有利的，比較在別一情況下，他們可以用較廉的價錢取得畜產品，特別是肉類。但是對遊牧民來說，這種商業是特感需要的，各地的遊牧民把畜群趕往靠近文明國家的移民區，而不等待商人來到草原上他們的家裏。這樣，他們逐漸熟悉伊斯蘭教徒的商品和一般的生活方式，他們不僅在宗教生活，而且在伊斯蘭文明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但是從遊牧民方面來說，只有在改信伊斯蘭教的情況下纔有可能和伊斯蘭教世界的文化結成密切的關係。”^[10]。

伊斯蘭教世界對中亞突厥人的那種經濟文化吸引力，東亞地區的華夏文化早在帝國形成以前就已具有。只是華夏族人主要以定居耕織為主，自給自足，傳統上缺乏宗教人士那種“佈道海外”的精神，除了防禦性經營外（如“尊王攘夷”，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之類），對周邊族群基本上採取以逸待勞

[9] 參拙文《拜火教與突厥興衰》，《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31頁。

[10] 見威廉·巴托爾德著，羅致平譯《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73頁。

的態度，於是乎：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入主出奴，用夏變夷。另一方面，儘管綠洲定居民的抗禦對草原遊牧人南進形成阻力，但是，萬里長城或許能夠抵擋戰爭的進攻，卻未必能夠阻擋主觀認同的願望，因為，這裏要涉及的並不是戰爭，而是社會生活、生存條件、經濟營生、文化取向等問題。所以，中國民族以柔克剛，反而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我認為，在中國古代這個帝國的政治體系（歷史官僚體制）裏，本身具有容納周邊族群進入參與的思想觀念和結構機制。思想觀念即所謂“入主出奴”，“用夏變夷”^[11]，大體如韓愈《原道》所說：“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結構機制方面，周邊族群進入參與帝國政治體系的形式因時不同：入主（“龍飛朔野，雄步中原”，問鼎中原），接受羈縻（屬國、外蕃、內蕃、土司），乃至異姓（臣屬）禪代等^[12]。所謂“征服王朝”只是進入中國歷史官僚體制的一種形式，因為其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有資格的族群都認同中國，且相互以兄弟視之（例如遼、宋王朝）。更重要的是，無論以何種形式進入帝國的政治體系，進入的族群或遲或早（甚至經歷反復）都會通過文化整合認同帝國的主流文化，入主或實現取代的族群也都會維持帝國意識形態的明顯連續性，以獲取政權合法性，或謂“爭中原正統”。歷史記憶一經改變，那麼，認同帝國政治體系——中國歷史官僚體制的族群最終要和主體

[11] 《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種觀念也隨著歷史演進有一個演變過程，這方面研究很多，可參劉浦江《正統論下的五代史觀》，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1頁以下；同作者《德運之爭與遼金王朝的正統性問題》，收入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1—26頁；姚大力《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與國家認同》，268—273頁。

[12] 中國歷史上與周邊關係的這一特點與流行的世界體系理論和依附理論所依據的西方近代歷史經驗正好相反，“世界體系理論和依附理論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正是因為核心地區具備了剝奪較為貧弱的邊緣地區的能力，纔導致了西方的崛起。先進發達的西方所擁有的財富是源自於核心地區從邊緣地區榨取剩餘勞動的能力”。（伯克著，王晉新譯《文明的衝突：戰爭與歐洲國家體制的形成》，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36頁）而東亞地區的歷史事實卻是周邊族群力求入主或形成羈縻以分享中原地區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

（中原）社會實現凝聚，成為中華民族（中國）的組成部分。

二、外蕃：社會演進的環境條件

由於地緣和歷史的原因，中國古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形成了特有的族際關係，歷代中央王朝處理這種關係的政策重點不同，成效也各有參差^[13]。至唐，則主要在周邊族群聚居地區實行羈縻制^[14]。《新唐書·地理志》七下“羈縻州”條：“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於令式。”^[15]可見，唐朝羈縻州的突出特徵是周邊族群在保留原有政治體制的情況下，以僚屬（地方政權）資格從形式上進入中央集權帝國的政治體系。不過，雖然都名為唐朝的一級地方政權（都督府或州），不同的族群甚至同一族群的不同群體由於其政治分化程度不同，其利益、立場和動向不盡相同，因而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實際上有層級的不同。在此基礎上，雙方（中央政策和族群活動）相互作用和影響也各不相同，於是形成了內蕃外蕃、熟番生番這些區別，進而發生了內外、生熟之間的流動和轉換。唐代羈縻州分有層級，前賢已有論列^[16]，此不贅述。本文這裏僅以契丹活動為例討論外蕃與帝國的政治體系——歷史官僚社會演進的關係。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載，則天后萬歲通天元年（696）“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

[13] 唐人的議論見《新唐書》卷二一五上《突厥傳》四夷傳總序，中華書局，1975年，6023—6025頁；參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8—12頁。

[14] 如楊聯陞所說：“隨著唐代邊區羈縻府州的建立，羈縻就變成專指一特殊制度的用語。”（見前引《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12頁）

[15] 《新唐書》卷四三下，1119頁。本人曾將唐朝羈縻州的基本特點歸納為五條，見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9頁。

[16] 見譚其驤《唐代羈縻州述論》，收入氏著《長水粹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36—162頁；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

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城側，《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作城傍。城傍，有研究認為是唐朝的一種特殊兵制^[17]。無論如何，羈縻制度不僅使周邊族群得以進入帝國的政治體系，從而促進其政治演進，同時也為帝國統治者提供了新的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自由流動資源，從設計上可以說是一項雙贏的制度。

據《舊唐書·契丹傳》：“契丹有別部酋帥孫敖曹，初仕隋為金紫光祿大夫。武德四年（621），與靺鞨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授雲麾將軍，行遼州總管。至曾孫萬榮，垂拱初累授右玉鈴衛將軍、歸誠州刺史，封永樂縣公。”這部分契丹顯然自唐初以來一直居於營州城傍。至於其婚姻部落的情況則有些不同。據《新唐書·契丹傳》，李盡忠的祖父窟哥，唐太宗貞觀年間“舉部內屬，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縣男，賜氏李”。松漠府初置何處，傳無明言。但傳列松漠府所領十州無孫敖曹、萬榮所任州名，似乎當時與營州城傍尚有距離。據嚴耕望先生考證，契丹牙帳幾經遷徙，但唐初置松漠府應在今內蒙通遼庫倫旗境內，距營州（治今遼寧朝陽）“近或二百里，多或五百里上下”^[18]。《新唐書·契丹傳》：“窟哥死，與奚連叛，行軍總管阿史德樞賓等執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窟哥有二孫：曰枯莫離，為左衛將軍、彈汗州刺史，封歸順郡王；曰盡忠，為武衛大將軍、松漠都督。”看來，松漠府是在與奚連叛平定以後纔被徙至營州城傍，即由外蕃變成了內蕃。

如前所述，唐朝的羈縻政策促進了周邊族群的政治分化和演進。唐制羈縻府州皆歸邊州都督府管領，營州為東北邊州，界內僅有柳城一縣，其餘皆為羈

[17] 參李錦繡《“城傍”與大唐帝國》，《學人》第8輯。有關討論見蘇航《唐代北方內附蕃部研究》，95、102、117—118頁，據其意見，城傍應該是內蕃部落制羈縻州的蕃團結兵。據唐律：“州縣有境界，折衝府有地團。”（《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中華書局，1983年，185頁）唐朝府兵的“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才力又均先取多丁”（同前卷一六《擅興律》，302頁）；在邊州及要害之地，被揀點的府兵組成行軍出征後，未被揀點的府兵要“倚團結”，由地方行政長官統領執行後勤保障及治安守衛等任務。這就是所謂“團結兵”。城傍既然是作為團結兵被興發，儘管羈縻府州長官一般就是部落首領，但其所擔負的任務恐怕主要還是後勤保障之類。

[18] 參氏著《唐代交通圖考》第5卷，中研院史語所，1986年，1737—1740、1756—1757頁，圖二十二。